

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

中法战争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

作者：贾宝波

年级：九〇级

导师：米庆余 教授

俞辛焯 教授

专业：世界地区、国别史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史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一九九三年五月

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

中法战争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

作者:贾 宝 波
年 级:九 〇 级
导 师:米庆余教授
俞辛焯教授
专 业:日 本 历 史
研究方向:日本外交史

南开大学
一九九三年五月

Japanese Diplomatic Policy During Chinese-French War

Abstract

This article wants to discus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diplomatic policy, the reason of this policy forming and its influence during Chinese-French War, 1883-1885

In this perio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ithstood a severe challenge on diplomacy. Although French government had approached Japan through many diplomatic channels, such as Beijing, Berlin, Tokyo, Paris, Shanghai for many times, in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a union with Japan, devising a military cooperation for China,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hose the diplomatic policy of neutrality, taking part in the cooperation of neutral countries proposed by England, and put forward a mediation plan upon Chinese-French war.

In this period, althoug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d attempted to avoid conflicting with China, it formulated a policy upon Korea. In December 1884, the Jiashen coup d'etat broken out in Seoul and the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ere just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policy. After the coup d'etat broke out, the French government put forward the proposal of establishing a Japanese-French union and devising a military cooperation for China upo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gain. But after serious discussing,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jected the French proposal again, established the diplomatic policy of dissolving the problem through peace way, and carried it out throughout Japanese-Korean and Japanese-Chinese negotiations.

There were three reasons wh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hose the neutrality diplomatic policy during this period. Fir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and and France became worse since 1880.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d gained this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1883. Second, the Chinese military power developed, and the Japanese national power was less relatively. Thir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as afraid that once the Chinese-French war was ended peacefully, China would concentrate its power to fight with Japan after it allied with France, and Japan would be in a harmful position. Japan was also afraid that if France occupied Taiwan, it would threaten Liuqiu and Japan itself.

Subjectively, the diplomatic policy of neutrality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uring this period gave a favou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it revising treaty and modernize. Objectively, it was advantageous for Chinese anti-France wa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istributed its power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gained a great diplomatic victory and raise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through the Jiashen coup d'etat and Chinese-Japanese Tianjin Treaty.

清仏戦争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政策(要約)

本課題は清仏戦争期(1883—1885)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政策及びその政策の成立した原因とその影響を究明しようと試みるものである。

清仏戦争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は本格的な試練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アジアの一国である日本はアジア地域で発生したこの戦争への対策決定という重大かつ難解な課題の解決に迫られていたのであった。この時期には、フランス政府は、対清政策上日本との「同盟」と対清共同戦線樹立を強く求め、北京、ベルリン、東京、パリ、上海などさまざまな外交ルートを通じて日本の外交当局者へ働きかけ続けたと同時に、日本の条約改正問題に対し、各国に周旋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承諾したのであり、また日本が対清戦争に参加するための戦費についてはフランスが低利で日本の募債に応じようとの方針を採ろうとしたが、けれども日本政府はフランスに対して拒否の態度を表明し、局外中立の外交政策を選択していたし、イギリスの首唱する「中立国家共同行動」に参加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ある。また、米英独諸国が清仏戦争に対する仲裁と調停に乗り出した後、日本政府も外交調停を試み、本国の講和案を提出していたのであった。

この時期には、日本政府はかつて清国との衝突をできるだけ避けようと試みたが、しかし朝鮮の親日派・独立党を援助し、清仏戦争の機に乗じて清韓宗属関係を廃棄させることを主な内容とする対韓政策を決めたのである。1884年12月朝鮮首都漢城で発生した「甲申政変」とその際の日清軍事衝突は日本政府のこの対韓政策の直接的な後果であろうと思われる。「甲申政変」が発生した後、フランス政府は再び日本政府に対し、日仏同盟・対清共同戦線樹立ということを提議したが、日本政府は清仏戦争をめぐる国際情勢を真面目に研究してから、再びフランス政府に対して拒否の態度を表明し、局外中立を前提にして「甲申政変」に対する平和解決の外交方針を決め、そしてこの方針を日韓交渉と日清交渉の中に貫徹実行させ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を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日本近代外交史の視角から見れば、この時期における日本政府のこの局外中立の外交政策は日本近代以来の伝統的な外交政策、つまり朝鮮と中国を侵略する所謂大陸政策の軌道を明らかにはずれたと言えよう。その原因は次のとおりである。第一、国際関係の視角から見れば、1880年代以来、英仏両国政府は従来協調提携の関係から少なくとも植民地問題に関してはライバルの関係へと入っていたが、それから間もなく日本政府はそのような英仏関係劇変の情報をつかんでいた；第二、近代以来の清国の軍事力の発展と日本の国力の相対的不足；第三、日本政府はフランスとの連合と対清共同作戦を始めた後、万一清仏戦争が平和に終結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清国が軍事力を集中して日本と対戦したら、日本は不利の地位に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また中国の台湾がフランスに占領^{占領}したら、琉球と日本本土もフランスの脅威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ぬと心配していたのであろうと思われる。

この時期における日本政府のこの局外中立の外交政策は、主観的には日本の条約改正問題とその近代化のために一つの比較的有利な国際環境を創造していたし、客観的には清国の抗仏戦争に対しても有利であったと言えよう。しかし否認できないのは、1884年12月日本駐韓公使が朝鮮首都漢城で画策した「甲申政変」はある程度フランス侵略者の侵清気焰を助長し、清国の対仏作戦の困難を増加して、清国政府をして軍事上の勝利に乗じて清仏戦争を速やかにやめさせる重要な原因と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要するに、日本政府は清仏戦争期に局外中立の外交政策を実行したことによって本国の条約改正問題とその近代化のために一つの比較的有利な国際環境を創造していた一方、また「甲申政変」とその後締結された『中日天津条約』を通じて朝鮮における日清両国の権力平等を実現し、外交上の勝利を獲得し、本国の国際地位を高めていたと思われる。

中法战争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

内容提要

本文拟考察中法战争时期(1883~1885)日本的外交政策以及该政策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法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政府必须正视这场发生在亚洲地区的战争,并提出应付局势变化的对策。在这一时期里,尽管法国政府曾多次通过北京、柏林、东京、巴黎、上海等多种外交渠道,与日本接近,企图与日本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为此而允诺在日本政府的修改条约问题上给予支持和合作,还允诺可以低息为日本政府在巴黎募集公债,但是日本政府反复权衡之后,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选择了局外中立的外交政策,参加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中立国家共同行动”,而且继美、英、德等国对中法战争进行仲裁和调停的努力之后,提出了本国政府对中法战争的调停方案。

在这一时期里,尽管日本政府曾竭力试图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但它还是制定了以援助朝鲜亲日派独立党、使其乘中法战争之机、废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对韩政策。1884年12月朝鲜首都汉城发生的“甲申政变”和中日军事冲突,恰是日本政府这一对韩政策的直接后果。值得注意的是,“甲申政变”发生以后,法国政府曾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缔结日法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建议。但是日本政府经过认真研究之后,再次拒绝了法国政府的这一建议,确定了在局外中立的前提下和平解决“甲申政变”的外交方针,并把这一方针贯彻在稍后举行的日韩双边谈判和日中双边谈判过程中。

从日本近代外交史的角度来看,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里所采取的局外中立的外交政策,明显逸出了日本近代以来的传统外交政策、亦即旨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所谓大陆政策的轨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1880年代以来英法关系恶化,日本政府最迟已在1883年初获得这方面的可靠情报;第二,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日本国力的相对不足;第三,日本政府既害怕与法国结盟后,一旦中法战争以和平结局,中国集中力量与日本作战,日本将处于不利地位,又害怕法国占领台湾,将对琉球和日本本土构成威胁。

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里实行的这一局外中立的外交政策,主观上为日本本国的修改条约问题和近代化进程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客观上则有利于中国的抗法战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1884年12月4日日本公使在朝鲜首都汉城导演的“甲申政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侵华气焰,增加了中国对法作战的困难,成为促使中国清朝政府乘胜议和、急于结束中法战争的重要原因。

总之,经过中法战争,尤其是通过《中法停战条件·巴黎议定书》以及稍后签订的《中法越南条约》,清朝政府完全放弃了中国在越南的宗主权,代之以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并使法国取得了在我国西南地区通商和修筑铁路的特权,从而满足了法国的侵略要求;通过《中日天津条约》,清朝政府允诺日本在朝鲜拥有与中国同等的出兵权,实际上等于放弃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从而使日本取得了进一步侵略朝鲜的便利。上述两起几乎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表明,中法战争时期中国清朝政府在两个最密切的藩属国问题上都遭到了严重的外交失败。与此相反,在这一时期里,日本政府一方面由于实行了局外中立的外交政策,从而为其本国的修约问题和近代化进程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则通过“甲申政变”以及稍后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从而实现了在朝鲜与中国的“权力平等”,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提高了本国的国际地位。

目録

Japanese Diplomatic Policy During Chinese-French War (Abstract).....	1
清仏戦争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政策（要約）.....	2
中法戦争時期日本の外交政策（内容提要）.....	3

中法戦争時期日本の外交政策

前言.....	1
一、中法戦争与“日法同盟”問題.....	2
二、中法戦争与日本の局外中立.....	6
三、中法戦争与朝鮮局勢.....	10
結論.....	15
注釋.....	17
参考文献.....	22
後記.....	24

中法战争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

贾宝波

前言

19世纪80年代,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侵略活动。当时,中国的周边国家大多仍处于中国清朝政府的“藩属国”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种藩属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Vassal States)和被保护国(States Under Protectorate)有所不同。在西方中世纪时期,封建主与其附庸国的关系可用宗主权来表示,封建主即是附庸国的宗主。封建制度被废除以后,宗主权一般指的是宗主国对附属国的国际权利。宗主权不是主权,由于附属国在国际上一般要由宗主国来代表它,因而它只是一种国际监护权。不过,这种情况也并非绝对。虽然附庸国和被保护国一般仍能保持内部的独立,但由于它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任何地位,所以它还不能算是国际法主体。〔1〕

中国封建时代的藩属国一般都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它们同中国的关系,存在着千年以上的历史。与西方的附属关系不同的是,它不是国际关系,也不是什么国际监护,而只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中国封建王朝对于藩属国的政策,历来是在政治上任其统治者自行管理,其内部事务不予干涉。藩属国的义务则是奉表称臣,表示归顺,并定期来华朝贡。只有当其内部发生派别斗争,又与中国某些官员有利害关系,以及遭受外来侵略时,中国封建王朝才进行干涉,并负有保护藩属国的责任。

中法战争的最初原因正是由于法国侵略中国的藩属国越南,中国清朝政府对此加以干涉,而最终引起的。〔2〕事实证明,中法战争乃是法国对越南和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一场中越两国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保家为国的反侵略战争。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因此中法战争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质。特别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中法战争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必然对中国清朝政府的外交策产生重要影响。中法战争的结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一复杂离奇的现象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法战争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薄弱。近年来,国内先后于1983年和1985年召开了“中法战争一百周年”和“镇南关大捷一百周年”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3〕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对中法战争的综合性研究。但是,学者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中法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局以及战争时期英、美、德、俄等西方列强对中法战争的立场、态度及其对清朝政府的外交决策所产生的影响,而中法战争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则是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研究课题。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就在盛传所谓“日法同盟说”,清朝政府曾经因此而感到忧虑。特别是1884年12月4日日本驻朝公使伙同朝鲜亲日派独立党在朝鲜首都汉城发动的“甲申政变”,更使清朝政府感到忧虑。这次政变由于处理及时而破产,但是却大大增加了中国对法作战的困难,从而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外交决策。清朝

政府由于害怕日法两国乘机勾结,使中国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所以不得不在围绕“甲申政变”的中日双边谈判过程中,对日本采取妥协方针。而且,清朝政府之所以在中国军队取得“临洮大捷”和“镇南关大捷”,一举收复谅山的情况下,“乘胜而收”,接受法国的屈辱的议和条件,造成重大外交失败,可以说也与此有关。

然而,中法战争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中法战争时期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政府对中法战争这场发生在亚洲地区的战争到底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外交政策?该政策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对中法战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切却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根据目前所接触到的史料,试图就上述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考察、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深入研究中法战争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不仅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研究之不足和全面把握近代日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当前的中日关系和今后的日本外交政策,也将是十分有益的。

一、中法战争与“日法同盟”问题

早在19世纪初,法国侵略者开始入侵越南。〔4〕1873年底,法军一度攻占河内。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的威胁下被迫签订了《越法西贡条约》,通过该条约,法国不但霸占了越南南部六省,而且还以承认越南独立为借口,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从而公开否定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在越南的宗主权。〔5〕但是中国清朝政府对此则不承认,自1880年起,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便屡次向法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对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活动不能默视。〔6〕于是,中法两国围绕越南问题矛盾加深。1882年4月25日,法军再度攻占河内,对中国边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中法关系日趋恶化。当时,法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源源不断地向越南派遣远征军团;另一方面则发起了一场外交攻势,多次通过北京、柏林、东京、巴黎、上海等多种外交渠道,与日本接近,企图与日本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

1883年4月26日,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在致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机密电报中称:“法国驻华公使宝海(F. A. Bouree)迫切要求日法两国采取共同行动(Seemingly anxious for cooperation).”〔7〕

4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又向井上馨发出一份秘密报告。其中,对4月24日夜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与榎本武扬关于中法关系与远东局势问题的谈话内容做了综合汇报。该报告由于涉及到“日法同盟”问题,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榎本武扬问宝海:“目前,越南事件是否有希望和平结局?”宝海回答说:“不可能。事到如今,只能决以胜负。目前,中国海疆陆地边防坚固,今非昔比,而且又无敌国。我国的行动,只在于损其外面。不过,贵国若能与我联合,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其事必成。”接下来,双方还讨论了如何进攻北京,需要多少兵力、以及最佳登陆地点的选择等。〔8〕他们两人的谈话,给人的最初印象是日法两国仿佛已经缔结了攻守同盟。

现有史料证明,上述有关“日法同盟”问题的交涉曾在驻北京的日法两国公使之间反复进行了磋商。与此同时,法国驻德公使在德国首都柏林也和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讨论过“日法同盟”问题。关于日法两国驻德公使就“日法同盟”问题的交涉情况,我们在《日本外交文书》等日本官方资料中未能找到原件,只是通过当事人青木周藏的私人笔记,才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青木周藏在其笔记中这样写道:“1883年。由于越南事件,中法两国之间发生了冲突。……然而曾一举击溃中国军队的法国军队,自开战以来出兵不力,连续多次为中国黑旗军击

退。恰在此时,法国驻柏林公使访问我。倡议日法两国政府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并且说:‘此事我国驻东京公使已秘密向贵国外务卿提议过,但是贵国政府不予同意。然而,听说贵公使与贵国外务卿井上馨关系亲密,相互信赖。所以,我特意来访,请贵公使做媒,重新将此事向贵国政府提出。贵公使深得我国信赖,请助一臂之力。’我虽不愿将本国外务卿既已拒绝的同一件事重新提出,但又难以拒绝法国公使的请求,所以我只好以电报方式将此事向外务卿井上馨做了汇报。事隔一天,收到回电,其中说:‘法国的倡议不能同意。关于如何答复法国政府,由贵官相机处理。’于是,我立即将日本政府不同意缔结日法同盟的消息转告了法国公使。”〔9〕

上述青木周藏笔记中的有关内容由于开头部分只有1883年字样,所以具体时间尚不明确。不过该笔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引起我们的注意,即:“参议伊藤博文当时正在柏林做宪法问题调查。”〔10〕现有史料证明,日本政府参议伊藤博文已于1883年6月上旬基本结束了他在德国首都柏林所做的宪法问题调查工作,并于同年6月中旬启程回国。〔11〕由此推测,上述法国驻德公使的“日法同盟”倡议最迟也要在1883年6月中旬以前。

1883年6月6日,法国外长谢莱梅尔·拉库尔(Challemei Lacourt)在巴黎会见日本新任驻法公使蜂须贺茂韶时表示:“对付中国,我们法日两国有着共同利益”,希望早日与日本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为此,法国外长还把这个问题同日本政府的修改条约问题联系起来,表示愿意为日本政府的修改条约问题提供帮助。6月15日,蜂须贺茂韶在致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秘密报告中对此做了详细汇报(略)。〔12〕无独有偶,1883年8月18日,法国驻日代理公使卡斯特尔(Viel Castel)在东京拜会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时,再次就“日法同盟”问题与日本政府的修约问题相联系,试探日本政府的意向,并且表示:“邻邦中国实属顽固不化之国,不足与谋。唯独贵国熟悉我国国情,堪与共事。考虑到贵国将来的对华政略,敝人认为若能与我我国相互联合,共同磋商,则有益无害。正所谓法日两国利害一致,缓急相当,这必将有助于东洋之开化。”〔13〕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法国政府在1883年8月中旬以前,已通过北京、柏林、东京、巴黎等多种外交渠道,与日本接近,急于同日本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为了投其所好,法国政府搬出日本明治初年以来的最大宿愿——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以似乎可以允诺日本政府所特别希望的“要点”这样的态度,引诱日本与其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毫无疑问,这是法国政府的外交策略。但是,法国政府这一精心策划的外交策略却迅速被日本政府识破。1883年7、8月间日本政府曾专门举行内阁会议,讨论中法两国围绕越南问题的纠纷与日本的外交政策问题。虽然日本政府内部确实有人主张接受法国政府关于缔结“日法同盟”问题的建议,尽快与法国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但是这一主张却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会议结束后,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在给驻法公使蜂须贺茂韶的训令中指出:“法国政府认为,在中国政府主张的所谓属邦主义问题上,日法两国有着共同利益。法国政府既想了解我国政府对‘东京(北圻)事件’的意向,又想了解我国政府在修改条约问题上所特别希望的要点。……法国政府一方面要帮助我国实现我国的宿愿;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我国以‘东京事件’为契机,与法国缔结同盟,借以否认中国的属邦说。据此推测,这只不过是法国的策略而已。”〔14〕

因此,井上馨进一步指出:“日中两国近年来继琉球事件之后,又发生了朝鲜骚动,中国政府对我国的怨恨日益加深。我国政府本应努力保全东洋之和平。然而,目前事件与我国毫无关系。假如因遥远的‘东京事件’,公然与一个西方国家结盟,那么必将使中国怒焰愈炽。左思右想,当前不能轻易同意法国的建议,也不能就‘东京事件’公开暴露与中国对抗的意图。关于日

法两国采取共同行动之事,请注意我国政府虽然不能公开赞同,但是私下可以赞成法国的主张,抨击中国的属邦主义,直到和平结局为止。请将此意委婉地转告法国政府。”〔15〕

与此同时,为了清除中国对日法关系暧昧和“日法同盟说”的忧虑,并上饬还训令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要他向中国政府解释日本政府关于日法关系的基本方针。榎本武扬根据训令精神,于同年7月26日向中国总理衙门解释说:“听说法国公使脱利古在与李中堂(鸿章)谈判过程中,动搬以我国政府与法国联盟相威胁。此乃纯属虚构,无稽之谈。脱利古之言,请不要相信。万一此人再口吐此言,诬蔑我国,实属浅薄。今天,我代表我国政府向贵大臣明确宣布,我国政府绝对无意、也绝对不会与法国缔结同盟。”〔16〕

由此可以看出,早在1883年7、8月间,日本政府已针对中法两国围绕越南问题的争端,确定了以拒绝法国政府提出的关于缔结“日法同盟”问题的建议和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政策,并已分别通过驻法公使和驻华公使将这一外交政策向中法两国政府做了通报。然而,1883年9月以后,“日中关系不稳说”和“日法同盟说”等却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迅速流传。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一方面有意识地制造和利用这种不负责任的谣言,向中国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仍然没有放弃与日本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愿望和企图。

1883年入夏以来,法军在越南战场上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同年7月,越南首都顺化府被法军攻陷,8月25日法国侵略者强迫越南签订了《越法新订和约》。通过该条约,法国终于使越南完全变成了它的保护国。而且还彻底否定了中越两国的宗属关系。〔17〕中国政府获此消息后,立即通过外交渠道向法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还多次向法国政府递交了措词强硬的抗议照会。〔18〕中国政府认为,法国政府否定中国在越宗主权的行是明显违反道义的,“中国不愿与法国失和,倘法国亦同此意,则仍可彼此互商妥协。其今观法国不愿交谊,办理不公,于中国兵丁所戍之国敢于相攻,是法国自欲失和也。盖中国既有兵戍守,法兵往攻,自必与之交战,则兵端由法国开之,其咎惟法人任之,兵连祸结,大伤和谊,中国均不受咎也。”〔19〕而且认为,“越之北圻,为滇粤屏蔽,断难听其侵占”,“目前办法,总以固守北圻为主,倘法人侵入我军驻扎之地,则衅自彼开,自不能不与接仗”。〔20〕

然而,法国侵略者对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抗议照会不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且还加紧进行对华战争的准备。1883年9月1日,法国驻日代理公使卡斯特尔前住日本外务省,并与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举行了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卡斯特尔首先通报了法国在越南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成果”,然后又把越南事件琉球问题相联系,希望与日法两国尽快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他说:“一旦发生邻国(中国)攻击越南或者琉球之事,日法两国应象两个刎颈之交的朋友一样,携手相助。”〔21〕

1883年10月16、17日两天,法国驻华公使脱利古(Tricou)与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在北京进行了长达两天的双边会谈。在会谈过程中,法国公使脱利古和公使书记官加利(Galy)反复强调日法两国缔结同盟的重要性,对此榎本武扬反问道:“同盟一词,其意甚广。比如双方缔结攻守同盟时,如果贵国与中国之间爆发战争,日本则应协助贵国与中国作战,另外,如果受到中国的攻击时,双方则应携手相助,共同予以抵抗。在这种情况下的同盟问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由于这是指形势危急、迫在眉睫时期而言。然而,象目前日尔曼与奥国的同盟则看不出有此种形势。阁下所称之同盟是专指战时而言,还是泛指平时而言?”反问中包含了法国是否要求日本与法国一起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的意思。脱利古回答说:“那要根据双方的约定行事。”其口吻仍然是试探性的。而榎本武扬则做出了如下明确的答复:“目前,中国和我国之交际虽不如我国与贵国这样密切,但也不存在我国与中国开战之事端。倘若因越南事件,贵国与中国开

战,我国也不会向中国施展诸如挑战之类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之意是指什么呢?”

针对榎本武扬的疑问,脱利古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要求日本给予合作。该交换条件是,法国政府答应与各国斡旋,帮助日本修改条约,而日本则要经常与法国合作,采取必要行动。并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幡然醒悟,与欧洲一两个强国结盟,那对贵国来说则是极为不利的。”但是榎本武扬并没有改变慎重稳妥的态度,他指出:“与他国结盟,共同出兵,是极为重大的事件,须临机决断。”榎本武扬在10月22日致井上馨的秘密报告中对此次会谈做了综合汇报。在该报告的末尾,榎本武扬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说:“该氏的真实意图在于:万一中法开战,法国欲与我国合作、共击中国,以节省本国之财力,此乃第一主义,或者在用兵方面确认我国事实上给予援助,此乃第二主义。”〔22〕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1883年秋,尽管日本政府早在同年7、8月间已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委婉地拒绝了法国政府提出的关于缔结日法同盟问题的建议,但是法国政府要求与日本缔结同盟的愿望却仍然很执着。现有史料证明,当时由于中法关系日趋恶化,所以法国政府千方百计地加强了对日策动。然而,日本政府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其既定方针。同年11月20日,井上馨在致驻法公使峰须贺茂韶的训令中指出:“对于法国政府,我们虽然在‘东京事件’问题上不能与其结盟,但是我们希望保持友好的局外中立,使之有利于我国的修约问题。千万注意,关于这一点,不容怀疑。正如贵君所知,讨论‘东京事件’,不能因法国政府提出修约问题,而为之所动。我国政府绝对不会与法国缔结同盟,并向中国宣战。我国政府必须对法国保持友好的局外中立。实际上,19日的电报即榎本公使的电报,我们已向中国驻日公使做了通报。而且,脱利古从中国回国时,曾顺路来到日本。他曾间接地让加利催促缔结同盟。但是,我们没有同意。”〔23〕

不久,同年12月,法国侵略军悍然进攻越南北圻地区的中国驻军防地,中国军队被迫起而抵抗,中法战争由此爆发。〔24〕

中法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国内外都在盛传所谓“日法同盟说”,所以中国清朝政府对此极为忧虑。恰在此时,精通法语的日本外交官原敬于1884年1月被日本政府派到天津,出任日本驻天津领事。由于清朝政府兵部尚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常驻天津,所以天津在当时成为清朝政府的外交中枢之地。原敬上任伊始,便立即前去拜会李鸿章。在与李鸿章会谈过程中,原敬为了消除中国当局对所谓“日法同盟说”的疑虑。向李鸿章明确表示,日本政府绝对不会、也不可能与法国缔结同盟。他说:“拙官临行之际,外务卿(井上馨)曾亲自传达上谕。拙官从东京出发时,曾再次会晤井上外务卿。外务卿明确告诉拙官:‘关于目前的中法关系,虽然社会上有各种流言,说什么一旦开战,日本将与法国缔结同盟等。然而,我认为并非如此。中国与我国之交际绝非如此浅薄。万一中法绝交,我国也绝对不会与法国缔结同盟。’此事虽与拙官职务无关,但却事关阁下,所以拙官理应如实加以陈述。”李鸿章高兴地说:“贵国与我国之交际本来如此,毕竟好似一国。正如贵官所言,我绝不听信谣言。我本人虽然未曾与井上外务卿面谈,但听其名,则可想象其人。外务卿的意思和我完全一致。”〔25〕

上述情况表明,中法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仍然重视对华外交,为此,还通过驻华外交官原敬向中国政府要人李鸿章解释日本政府对中法战争的外交政策,正面否认了“日法同盟说”,并力图与中国政府达成相互理解。

另一方面,进入1884年以后,法军在越南战场上连续攻占了越南北部的山西、北宁、太原等地;中国军队则由于指挥不利,而节节败退。在此情况下,法国海军总兵福祿诺(F. F. Fournier)于1884年4月17日通过德籍海关税务司德瑾琳(Gustaw Detring)向李鸿章提出议

和的建议。李鸿章不顾国内主战派的压力，于同年5月11日在天津与福祿诺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又称《中法天津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中国将驻越军队撤回本国境内，并对越法所有已订和未订条约，“概置不问”。〔26〕

上述《中法天津条约》的签订，虽然曾使中法两国的紧张关系一度得到缓解，但是由于同年6月23日中法两国军队在越南北部再次爆发了武装冲突，所以事态急剧恶化。〔27〕事实上，中法战争从1883年12月法军进攻越南北圻地区的中国驻军防地、正式挑起战端时即已开始，到1884年7月中法谈判陷于僵持状态为止，战争主要是在越南北部进行。1884年6月在越南北部再次发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只不过是宣而战的战争行为的继续。〔28〕此后，中法两国虽然在上海重新开始了新一轮谈判，但是由于法方强烈要求撤兵赔款，而中方则只同意撤兵，拒允赔款。所以，中法谈判陷于僵局。法国侵略者见要素未遂，即悍然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8月4日，法军进攻台湾基隆，但被中国守军击退。〔29〕8月19日，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V. de Semalle)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21日下旗离开北京。23日法国海军突袭福建马江，炮轰福州马尾船厂，中国福建海军全军覆没。26日中国清朝政府颁布诏令，对法国宣战。〔30〕从此，中法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总之，从1883年4月到1884年8月，尽管法国政府为了打击中国，曾多次通过北京、柏林、巴黎、东京等多种外交渠道，与日本接近，企图与日本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为此还允诺在日本政府的修改条约问题上提供帮助，但是日本政府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早在1883年7、8月间已经确定了以拒绝法国政府提出的关于缔结“日法同盟”问题的建议和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政策，并将这一政策分别通过驻法公使和驻华公使向中法两国政府做了通报。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中法关系日趋恶化，所以法国政府仍然千方百计地加强了对日策动。然而日本政府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其既定方针。特别是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仍然重视对华外交，为此还再次通过驻华外交官原敬向中方解释日本政府对中法战争的中立政策，正面否认了“日法同盟说”，并力图与中国政府达成相互理解。所以，从1882年中法两国围绕越南问题发生纠纷以来，直到1884年8月下旬中法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为止，所谓“日法同盟”问题在日法两国之间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更没有成为现实，只不过是法国政府的一厢情愿而已。

二、中法战争与日本的局外中立

1884年6月下旬，中法两国军队在越南北圻地区再次爆发武装冲突以后，中国清朝政府由于担心日法两国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从而使中国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所以十分关注日本的动向。同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参议兼外务卿井上馨通报了中法两国军队在越南北圻地区的冲突情况，同时还递交了一份关于请求日本政府保持局外中立的外交照会。〔31〕

由于当时中法两国事实上早已进入战争状态，特别是同年8月23日法国舰队突袭福建马江以及8月26日中国政府对法宣战以后，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日本政府对中法战争的局外中立政策。于是，他首先决定与日本政府参议伊藤博文进行协商。同年8月31日，井上馨在致伊藤博文的信中写道：“由于想与您商量一下有关中立事宜，所以，希望明天早晨9:00左右能够去一下贵府，或者若您方便的话，顺便来一趟官邸。英国公使已经回到东京，敝人得知后，立即请他于今天晚上打电报给英国政府，以便听取英国政府的意见。到目前为

止,尚未答复中国公使有关该国政府请求我国局外中立的照会。只是表示已经收到。中国公使的照会文书和中国政府的宣战(declared War),其意不太明确。因此,想与您商量一下。”〔32〕

在这里,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在决定日本政府对中法战争的外交政策时,却首先决定要听取英国政府的意见。那么,中法战争时期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为什么会对日本政府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当时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自19世纪80年代初以来,英法两国在对外政策和殖民地问题上终于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相互协调关系,开始成为相互竞争和敌对的关系。早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0~1870),英法两国在外交政策和殖民地问题上,可以说都在相互利用。譬如,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1854~1856),英法联军对俄国的共同作战;〔33〕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1856~1860)。英法联军对中国的野蛮侵略〔34〕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间,虽然在日本的幕末维新时期由于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偏袒日本萨摩藩和长州藩等反幕势力,而法国驻日公使洛舒(Roches Leon)则支持幕府政权,一度造成英法两国对日政策上的暂时对立,但是由于法国政府及时召回了驻日公使洛舒以及旧幕府政权的迅速垮台,从而使英法两国的对日政策不久又恢复了相互协调。〔35〕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以后,法国的外交政策在整个1870年代可以说仍然维持着与英国的相互协调关系,譬如,1876年埃及的国家财政恶化时期,英法两国曾相互协调,责任分担,在埃及建立起一种联合财务管理体制(Condominium)。〔36〕然而,进入1880年代,英法两国之间终于结束了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相互协调关系,特别是在殖民地问题上两国之间逐步开始对立起来。最初两国之间出现裂痕的是1880年的马德里会议上。本来该会议是由英国主动建议召开的,但是在讨论摩洛哥的改造问题时,却由于法国的反对而遭破坏。〔37〕接着而来的是一个更具决定性的问题。1882年6月,由于埃及爆发了民族主义运动,英国于同年7月10日向埃及政府发出最后通牒,7月11日英国舰队炮击亚历山大市,8月2日英军占领苏伊士,9月15日占领埃及首都开罗,不久即完成了对整个埃及的军事占领,从而彻底破坏了英法两国在埃及建立的联合财务管理体制。〔38〕上述事态的发展,对英法关系带来严重影响。对此,英国学者泰洛曾评论说:“英国对埃及的占领,摧毁了英法两国持续20多年的自由同盟。虽然法国人欢迎民族主义武装的失败,但他们却因未能取得波拿巴的遗产而感到羞辱。……这使他们(法国人)对英国人更加怨恨,在法国的政策中,埃及问题盖过了其他任何问题。……该自由同盟的破裂,尽管没有在英法两国之间引起战争,但是却在欧洲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39〕

日本政府实际上最迟在1883年初已经获得了上述有关英法关系发生剧变的可靠情报。当时,日本驻英公使森有礼在1882年12月15日致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秘密报告中对此做了综合汇报。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距今两三年前,法国驻华公使赴北京之际,法国政府已决定要吞并越南。为此,法国政府已将密令交予该公使,同时还向停泊在中国沿海的法国舰队下达了命令。中国政府得知后,立即向越南境内派兵驻守。而法国公使则试图阻止。于是,中国政府表示:‘越南自古以来向中国纳贡,受中国册封,实为中国属邦。若他国妄想插足中国之属地,中国政府决心予以阻止。’对此,法国公使十分顾虑,因而秘密策动英德两国公使,希望通过获得英德两国的支持,以实现其目的。然而,香港总督海奈西尼奥得知后,宣称:‘越南与英国虽无直接关系,但香港则是英国在东洋所占有的贸易要冲之地。如果中法两国在越南发生战争,必将波及香港,以致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所以,我们将静观形势的发展,决不会让法国为所欲为。’英国政府对此也予以肯定。当时,中国政府训令驻英公使,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赞助。英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训令驻华公使及驻东洋地域的文武官员,要他们设法阻止法国

政府的企图。……然而,后来法国政府仍然决定要在越南大震国威,并欲占领整个越南。中国驻英公使迄今一直在与英国政府秘密交涉。英国政府已决定阻止法国的企图。法国虽欲占领整个越南,但时机尚不成熟(下略)。”〔40〕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早在1882年底,最迟也要在1883年初已经获得英法关系发生剧变以及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日趋敌对化的可靠情报。幕末维新以来,英法两国与日本的关系都极为密切,因此,英法两国关系的恶化必然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从1883年4月到1884年8月下旬,尽管法国政府曾多次通过多种外交渠道,与日本政府接近,企图与日本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为此还允诺在日本政府的修改条约问题上给予支持,但是日本政府考虑到如果与法国缔结同盟,就必然意味着要与英国这个在世界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发生对立,因而早在1883年7、8月间就已经确定了以拒绝法国政府提出的关于缔结“日法同盟”问题的建议和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政策。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1884年7月下旬,日本政府实际上已经派出天城号和扶桑号两艘军舰,参加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中立国家共同行动”。日本与英国同处一个阵营,在当时已成事实。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尚有日本海军卿致外务卿的机密信翰。其内容主要是日本海军少将松村淳藏于同年8月6日从中国上海写给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的报告。该报告叙述了中法谈判问题以及7月30日到8月6日的当地情况。其中还有一份附件,即“英国支那舰队司令德威尔致日本海军司令松村淳藏少将的信”。现将该信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大日本皇帝陛下海军司令官海军少将松村淳藏阁下:

为了防止中法战争时期的人民骚动和排外事件的发生,各中立国家的海军军舰舰长拟共同合作,以保护各通商口岸的局外中立国人民。此决议已于去年商定。目前,正处于危机时期,英国政府已向各同盟国政府发出通告,希望上述决议继续有效。因此,敝人率领我国舰队,将有关各同盟国军舰在中国沿海各通商口岸的配备方法及各国军舰的维修事宜,向阁下汇报。

中国沿海各通商口岸配备情况如下:(略)

敝人希望增加天津及扬子江等地的军舰,为此已向俄、德、美三国海军司令发出呼吁,必要时对上述各通商口岸各中立国人民加以保护。现就增加临时防御,派遣军舰事宜,特此知照。

英国支那舰队司令 德威尔

1884年7月26日,北纬29°东经122°威治兰特号。”〔41〕

在这封信中,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保护各通商口岸局外中立国人民。此决议已于去年商定。”这里的所谓“去年”明显是指1883年。也就是说,1883年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参加由英国政府倡导的“中立国家共同行动”。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日本外交文书》等日本官方资料中没有查到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奇叶楠在其《1880~1885年英国对华外交》一书中对此有所涉及。据他考证,1883年11月中旬由于法国官方宣称,为了打击中国,将要把中国沿海所有通商口岸的华人居住区夷为平地,为此每一艘法国军舰都已接到命令,所以英国政府闻询以后,立即于同年11月下旬邀请意大利、俄国、葡萄牙、奥地利、德国、美国、日本等国一起参加所谓“中立国家共同行动”。其宗旨是保护各局外中立国人民,同时也隐含着要阻止法国对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封锁和轰击行动的意图。日本政府当时同意了英国政府的倡议,并决定参加“中立国家共同行动”。〔42〕

另外,我们在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外交篇》一书中也发现了部分与此有关的史料。伊藤博文在该书中指出:“由于中法两国围绕越南问题的争端大有无法调解之势,所以英国政府根据中立惯例,邀请我国以及其它中立国家,采取共同行动,以确保各中立国在华侨民的生命及

财产的安全。为此,英国代理公使去年(1883年)12月7日送来一封信,征求我国政府的意见,如甲号文书。我国政府由于已经确定了局外中立的方针,所以对此做出了表示同意的答复,如乙号文书。然而,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要派出我国军舰,还为时尚早。不久,英国代理公使于同年12月31日又送来一封信,通知我国有关英国亚洲舰队司令威尔士的倡议,如丙号文书。后来,我国政府根据从前的答复(乙号文书),决定同意英国海军司令有关派遣军舰的倡议,并迅速做出答复,如丁号文书。”〔43〕

在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日英两国从1883年12月到1884年1月中旬围绕“中立国家共同行动”问题相互协商的基本经过。接下来,仅就上文提到的甲号至丁号文书做一下说明。首先,所谓甲号文书是指1883年12月7日英国驻日代理公使致日本政府的一封信。我们在现有史料中尚未查到原件。不过,由于乙号文书是针对甲号文书的一封复信,所以有关甲号文书的基本内容,我们大致可以从乙号文书中推测到。现存乙号、丙号和丁号三篇日英两国之间讨论有关“中立国家共同行动”的外交文书(略)表明,前述1884年7月下旬日本政府派遣天城号和扶桑号两艘军舰,参加“中立国家共同行动”,实际上早在1883年底和1884年初已经决定了。〔44〕,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在中法两国于1883年12月在越南北圻地区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形势下,曾经面临着两种十分困难的抉择,即:是与法国缔结同盟、与中国形成敌对关系?还是参加以英国为中心的“中立国家共同行动”,对中法两国坚持局外中立的既定方针?历史事实证明,日本政府当时选择了后者。

必须指出的是,中法战争时期英国联合日本、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等国搞的这次所谓“中立国家共同行动”,亦即集中上述各中立国家在中国沿海的舰队,必要时准备采取共同行动,其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为了防范中国民众的排外行动,保护各中立国家的在华侨民;二是为了警告和孤立法国,阻止法国对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封锁和轰击行动。而日本参加这次所谓“中立国家共同行动”,其目的则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除了旨在保护日本侨民之外,并不是为了与法国对抗,而是为了避免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使之有利于日本的修改条约问题和进一步提高日本本国的国际地位。

1884年9月1日,日本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如约会见了外务卿井上馨。二人讨论了中法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以后的国际形势,进一步确定了日本政府对中法战争的局外中立政策,起草了《天皇关于局外中立的敕旨》、《大政大臣关于局外中立的声明》、《局外中立规则案·外务卿致各地的训令》、《外务卿致各地方官关于局外中立的训令》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45〕现将《天皇关于局外中立的敕旨》摘要如下:

“朕衷心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如今不幸的是,法兰西国与中国之间发生了战争。朕历来与两交战均保持同盟和亲之交谊。为了使朕的臣民永保和平和幸福,兹决定:当此两国交战之际,断然采取严正不偏之局外中立。”〔46〕

上述《天皇关于局外中立的敕旨》以及其它一系列关于局外中立的政策性文件表明,日本政府在中法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以后进一步确定了对中法战争的局外中立政策。

1884年9月30日,法军再次入侵台湾。10月1日,攻陷基隆。在此期间,淡水港也一度被攻陷。10月23日,法国宣布封锁台湾。同一天,法国驻日公使席恩奇威茨(J. A. Sienkiewicz)向日本外务卿井上馨递交了法国政府关于封锁台湾的外交照会。〔47〕这样,由于中法战争不断升级,已经危及到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所以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相继对中法战争提出了各自的调停方案,并为此做了种种尝试。〔48〕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感到,台湾面临着被法国占领的严重危机,一旦台湾被法国占领或者

被清朝政府割让给法国,都将对琉球和日本本土构成严重威胁。因此,1884年11月18日,日本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榎本武扬,要他向中国清朝政府提议,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防止丧失台湾,可采取向法国借款、修筑铁路,以代替战争赔款的方案。11月21日,再次训令榎本武扬,电文中说:“关于调停问题,我国政府同意与美国采取共同行动。”〔49〕

11月23日,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根据上述训令精神,前往中国清朝政府总理衙门,探询中方对结束中法战争的意向,并提出调停建议。针对当时的战争形势和台湾所处的危险局面,榎本武扬向清朝政府提出警告说,如果中方不接受日本的调停方案,继续与法国作战,以致使法国乘机占领台湾,则“须知此事对亚洲全局影响甚大”。〔40〕由于榎本武扬提出的调停方案,亦即通过向法国借款、修筑铁路、以代替战争赔款,对中国不利,所以清朝政府对此并未接受。从当时中法两国在西部战场(主要是指越南北圻地区)和东部战场(主要是指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的形势来看,外交调停的时机尚不成熟。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中法战争时期日本以及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作为中立国对 中法战争的外交调停,无疑是符合国际法中有关仲裁和调停原则的。〔51〕尽管日本以及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调停都是基于它们本国的国家利益,害怕中法战争的长期化会严重损害它们各自的在华利益,因而在调停过程中,有时甚至偏袒法国,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就以此断定日本以及美、英、德等西方国家对中法战争的外交调停,都是在帮助法国,压迫中国,〔52〕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中法战争与朝鲜局势

朝鲜同越南一样,自古以来与中国千里接壤,唇齿相依。19世纪80年代,朝鲜在政治上仍然处于中国清朝政府的从属地位,朝鲜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朝鲜局势的变化常常对中国发生直接影响。日本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朝鲜制造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加紧干涉朝鲜内政,妄图实现其所谓“大陆政策”。〔53〕中国清朝政府因受边境危机震动的刺激,一直对朝鲜被日本欺凌的境遇表示严重关注。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以后,清朝政府基于国防的考虑,开始从各方面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54〕同时还采纳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企图借助欧美列强的势力均衡来阻止日本的“北上”和俄国的“南下”,劝阻朝鲜政府于1882—1886年同美、英、德、意、俄、法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55〕另一方面,在朝鲜,虽然亲中国的闵妃派事大党通过“壬午兵变”掌握了政权,但是以金玉均、朴泳孝等为首的亲日派独立党(又称开化派)也逐渐在朝鲜政府内部扩大了势力。他们从对抗闵妃派、企图拥戴国王、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实现民族独立的立场出发,积极接近日本,企图借助日本势力,达到其实现朝鲜的改革和独立的目的。日本则由于围绕朝鲜问题与中国的矛盾不断加深,所以也企图利用朝鲜亲日派独立党来实现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56〕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清朝政府消极抗战,致使法军顺利地攻占了越南北圻地区的山西、北宁、太原等地。特别是1884年8月法国舰队攻击基隆和福州,中国军队连战连败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立即在日本激起了强烈反响。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预测说:“难以期望庞大的东洋老大帝国他日不会陷于瓜分龟裂,并为西方数国所肢解。”〔57〕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则认为,中法两国正在激战,中国清朝政府肯定无力顾及朝鲜问题,这是从朝鲜驱除中国势力的极好时机,因而便企图策划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58〕而法国政府一再要求与日本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情报,则进一步助长了他的上述企图。在此前后,朝鲜亲

日派领袖金玉均曾多次前往日本活动,寻求日本援助。〔59〕福泽谕吉为了对金玉均等朝鲜亲日派独立党表示支持,派其得意门生井上角五郎、牛场卓造、高桥正信等人前往朝鲜,使其援助朝鲜亲日派独立党。日本自由党领袖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则与法国驻日公使席恩奇威茨秘密磋商,企图乘中法战争之机在朝鲜发动政变,废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为此请求法国政府给朝鲜亲日派独立党 100 万日元的政治借款,以朝鲜的矿山资源为抵押。对此,席恩奇威茨为了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先以个人资格表示赞成,并答应尽快请示本国政府,如有必要可向朝鲜派遣军舰予以支援。〔61〕该阴谋计划不久被后藤象二郎泄露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得知后,深感事关重大,立即转告了外务卿井上馨,井上馨闻询以后,当即表示,如此重大外交事件决不能让在野党胡来。〔62〕

然而,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却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的对韩政策。在此以前,日本的对韩政策是以维持中日韩三国现状为其基础的,但由于中法战争的爆发,远东国际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所以日本政府急于重新确立对韩政策。1884 年 10 月,日本政府曾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韩政策问题。参加讨论的主要有日本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参议兼外务卿井上馨、外务大辅吉田清成,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等四人。有迹象显示,井上馨和竹添进一郎主张采取积极政策,亦即乘中法战争之机,从朝鲜驱除中国势力,使朝鲜一举实现独立自主。为此与中国发生某种程度的摩擦,也在所不辞。与此不同的是,伊藤博文和吉田清成虽然也都主张更新对韩政策,但其前提条件则是要绝对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于是,经过认真磋商,迅速确定了新的对韩政策,亦即在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前提下,积极援助朝鲜亲日派独立党促进朝鲜的独立。作为刷新对韩政策的第一步,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地向朝鲜政府退还 40 万日元的“壬午赔款”。〔63〕本来,“壬午赔款”就具有政治意义,所以日本政府这次放弃这一权利,其目的在于希望因此博得朝鲜政府的好感。为了贯彻这一新的对韩政策,井上馨训令正在回国休假的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要他立即返回汉城,并赋予他处理朝鲜问题的全权。〔64〕。

1884 年 10 月 30 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返回汉城。10 月 31 日,他召集日本使馆书记官岛村久和时任《汉城旬报》主编的井上角五郎等人,宣称:“我国政府已决定攻打中国,对朝鲜也要伺机而动。为了博取人心,已决定退还 40 万日元的(壬午)赔款。”〔65〕11 月 1 日,竹添进一郎谒见朝鲜国王时,表示他奉日本皇帝圣谕,退还“壬午赔款”的余额 40 万日元,并以日本政府的名义赠送汽艇一艘,山炮两门,及炮车附属品等,还故弄玄虚地调拨离间,要朝鲜国王乘中法战争之机,实现朝鲜的独立和自主,并允诺若国王遇上危急,将一定倾全力予以保护等。〔66〕与此同时,竹添进一郎还与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亲日派独立党分子频繁来往,怂恿他们乘中法战争之机,加紧扩大独立党势力。因此,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亲日派独立党便在竹添进一郎的直接支持下肆无忌惮地着手发动政变,并于 11 月 4 日制定了以暗杀闵妃派政府要人、根据国王的请求、由日本公使带兵进宫,组建新政府等为主要内容的秘密政变计划。〔67〕

另一方面,在朝鲜,当法国舰队攻击基隆和福州,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利的消息传来以后,中国作为宗主国的权威明显地受到了削弱,不但朝鲜亲日派独立党见有机可乘,密谋发动政变,废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而且连朝鲜国王也发生了动摇。早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返回汉城前夕,中国驻朝军事帮办袁世凯已观察到朝鲜君臣的骚动情绪,担心有变,特向清朝政府汇报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司,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